

外国留学生汉语不及物动词习得研究

朱秀杰, 朱欣宇

宁波大学 外国语学院, 浙江 宁波 315000

摘要: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和中英词义配对的测试问卷,对三组被试者进行实验动词熟悉度判断测试和词义配对测试,通过可接受度判断任务考察外国留学生对汉语不及物动词句法和语义的习得。研究发现:不同水平的外国留学生均已习得汉语不及物动词的句法特征,他们能够区分汉语不及物动词内部句法结构的差异;高水平外国留学生已习得汉语不及物动词的语义特征,而低水平外国留学生尚未充分习得存现类非宾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的语义特征;高水平外国留学生汉语不及物动词的习得表现与汉语母语者相似。这一研究结果对汉语二语教材编写与教学具有一定的启示:其一,汉语二语教材编写者应遵照循序渐进的原则,注意把握汉语不及物动词内部语义特征和句法特征的差异及其习得难度等级。其二,应将汉语非作格动词的语义特征和句法特征编写在初级阶段的教材中,把汉语非宾格动词的语义特征和句法特征编写在中、高级阶段的教材中。其三,汉语二语教师应采用分类教学、先易后难和语义句法句式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来讲授汉语不及物动词的语义特征和句法特征。

关键词:外国留学生;汉语不及物动词;习得;非宾格假说

中图分类号:H195.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5.04.014

文章编号:2096-9864(2025)04-0104-07

2005年首届“世界汉语大会”在北京召开后,汉语日益成为世界解读中国、走向中国的桥梁,学习汉语的人数大规模增长^[1],学界关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成果也随之增多。已有研究发现,汉语不及物动词独特的句法结构是汉语二语学习者的习得难点^[2-6]。针对该难点,现有相关研究尚未从不及物动词句法和语义本体特征的视角给出充分解释。有关不及物动词的句法分类,美国语言学家 D. M. Perlmutter^[7]于1978年曾提出“非宾格假说”,将不及物动词分为非宾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两大类。根据该假说,两类不及物动词都只有一个

论元,非宾格动词的论元既可以出现在动词前也可以出现在动词后,如上海到了/到了上海;而非作格动词的论元只能出现在动词前,如小明笑了/*笑了小明。1995年,美国语言学家 B. Levin 等^[8]认为,两类不及物动词内部句法结构的差异由语义决定并由句法结构来体现。有关不及物动词的语义分类,爱丁堡大学教授 A. Sorace^[9]于2001年基于非宾格动词的终结性语义特征和非作格动词的施事性语义特征,提出“不及物动词层级分类”理论,将不及物动词细分为表位置变化非宾格动词、表状态变化非宾格动词、表存现非宾格动词、不可控制过程

收稿日期:2024-06-2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BYY102)

作者简介:朱秀杰(1983—),女,河南省周口市人,宁波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二语习得、二语加工。

类非作格动词和可控制过程类非作格动词。其中,表位置变化非宾格动词的终结性语义特征最为凸显,是核心非宾格动词;表存现非宾格动词的终结性语义特征较不凸显,是边缘非宾格动词;不可控制过程类非作格动词的施事性语义特征较不凸显,是边缘非作格动词;可控制过程类非作格动词的施事性语义特征最为凸显,是核心非作格动词。当前学界关于不同水平的汉语学习者能否习得汉语不及物动词的句法特征和语义特征,他们的习得表现与汉语母语者有何异同,鲜有研究深入探析。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实证研究考察不同汉语水平的外国留学生对汉语不及物动词句法和语义的习得,及其与汉语母语者习得的异同,以期为汉语二语教材编写与教学提供参考。

一、研究设计

1. 研究问题

为更深入探析不同汉语水平的外国留学生对汉语不及物动词句法特征和语义特征的习得程度,本研究主要聚焦以下两个问题:(1)与汉语母语者相比,不同汉语水平的外国留学生能否习得汉语不及物动词的句法特征?(2)与汉语母语者相比,不同汉语水平的外国留学生能否习得汉语不及物动词的语义特征?

2. 被试者确定

本研究的被试者主要包括 32 名留学生和 20 名汉语母语者,他们均来自国内某“双一流”大学。留学生被试者的母语背景为俄语、英语、德语、阿拉伯语、马达加斯加语,留学生被试者的汉语水平测试题采用 C. S. H. Wong^[10] 研究中运用的汉语水平测试题 (Chi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简称 CPT), 同时参考留学生被试者的 HSK 考试等级,把得分在 13 ~ 24 分的 17 名留学生归为高水平组,得分在 4 ~ 11 分的 15 名留学生归为低水平组。独立样本 T 检验结

果显示,高水平组和低水平组留学生被试者的汉语水平有显著差异($p < 0.001$)。20 名汉语母语被试者为参照组。被试者的相关信息见表 1。

3. 资料选取

本研究的汉语不及物动词选自《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修订本)中的甲级和乙级不及物动词,同时参考了袁博平等^[3-4]研究的实证材料,共选取 50 个汉语不及物动词,汉语不及物动词分类及其示例见表 2。

本研究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 (Likert scale, 1—5 代表非常不熟悉到非常熟悉) 和中英词义配对的测试问卷对三组被试者进行实验动词熟悉度判断测试和词义配对测试。三组被试者的熟悉度判断结果显示:汉语母语组对五类动词的熟悉度均较高,熟悉度判断结果没有显著差异 [$F(4, 95) = 1.05, p = 0.38$]; 高水平留学生组对状态变化非宾格动词的熟悉度 ($M = 4.50$,

表 1 被试者相关信息

被试者	人数 /人	CPT 平均分/分	年龄 /岁	汉语学习 年限/年
汉语母语组	20	—	19.30 (1.49)	18.80 (2.38)
高水平留学生组	17	18.00 (3.08)	25.24 (5.11)	3.32 (2.25)
低水平留学生组	15	8.33 (1.99)	24.07 (4.54)	1.70 (0.98)

注:括号内数字为标准差,下同。

表 2 汉语不及物动词分类及其示例

汉语不及物动词	动词类型	实验动词示例
非宾格动词	位置变化非宾格动词	来、到、去、掉、走、落……
	状态变化非宾格动词	断、开、关、烧、亮、灭……
	存现类非宾格动词	死、活、没、出现、消失、存在……
非作格动词	不可控制过程类非作格动词	笑、哭、病、饿、感冒、出汗……
	可控制过程类非作格动词	跑、坐、躺、玩、飞、游泳……

$SD = 0.42$) 显著低于对位置变化非宾格动词的熟悉度 ($M = 4.73, SD = 0.31, p = 0.03$) 和存现类非宾格动词的熟悉度 ($M = 4.75, SD = 0.32, p = 0.02$), 对不可控制过程类非作格动词的熟悉度 ($M = 4.81, SD = 0.23$) 和可控制过程类非作格动词的熟悉度 ($M = 4.92, SD = 0.18$) 没有显著差异 ($p = 0.27$); 低水平留学生组对位置变化非宾格动词的熟悉度 ($M = 4.12, SD = 0.55$)、状态变化非宾格动词的熟悉度 ($M = 3.73, SD = 0.77$) 和存现类非宾格动词的熟悉度 ($M = 3.97, SD = 0.70$) 没有显著差异 ($p > 0.05$), 对不可控制过程类非作格动词的熟悉度 ($M = 4.27, SD = 0.54$) 和可控制过程类非作格动词的熟悉度 ($M = 4.61, SD = 0.59$) 没有显著差异 ($p = 0.15$)。词义配对测试结果显示: 高水平留学生组和汉语母语组对五类动词的词义配对正确率均无显著差异。低水平留学生组对位置变化非宾格动词词义配对的正确率 ($M = 72\%, SD = 0.21$) 显著高于对存现类非宾格动词词义配对的正确率 ($M = 61\%, SD = 0.29, p = 0.01$) 和对状态变化非宾格动词词义配对的正确率 ($M = 59\%, SD = 0.24, p = 0.01$); 对不可控制过程类非作格动词词义配对的正确率 ($M = 83\%, SD = 0.19$) 和可控制过程类非作格动词词义配对的正确率 ($M = 89\%, SD = 0.17$) 没有显著差异 ($p = 0.13$)。低水平留学生组对状态变化非宾格动词和存现类非宾格动词词义配对的正确率均显著低于高水平组和汉语母语组 ($p < 0.05$), 低水平留学生组对位置变化非宾格动词和不可控制过程类非作格动词词义配对的正确率均显著低于汉语母语组 ($p < 0.05$)。

本研究把选定的 50 个实验动词分别纳入“NP + V”和“V + NP”两种句式中, 共有 100 个实验句。可接受判断任务实验句如表 3 所示, 实验句的格式参考了袁博平^[3]研究的实证材料。

可接受判断任务实验句编制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 实验要求被试者对实验句作出可接受度判断; 所有实验句的上方均标注拼音, 所有指示语均为英语; 实验过程中, 被试者不得使用手机、查阅纸质材料或与人交谈。

二、研究结果分析

1. 汉语不及物动词句法特征的习得结果

通过实验, 我们可以得到被试者对汉语非宾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可接受度判断的平均值, 见表 4。由表 4 可知, 汉语母语组对汉语非宾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的可接受度均高于高水平留学生组和低水平留学生组。同时, 三组被试者对汉语非作格动词的可接受度均高于对汉语非宾格动词的可接受度。

为进一步比较分析三组被试者对汉语非宾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的可接受度判断均值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 本研究以组别为组间因素、以动词类型为组内因素, 进行 3×2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 动词类型主效应显著 [$F(1, 49) = 84.99, p < 0.001$]、动词类型和组

表 3 可接受判断任务实验句示例

动词类型	句式	实验句
位置变化	NP + V	下一站, 上海到了。
非宾格动词	V + NP	下一站, 到了上海。
状态变化	NP + V	早上, 窗户关了。
非宾格动词	V + NP	早上, 关了窗户。
存现类	NP + V	因为缺水, 很多人死了。
非宾格动词	V + NP	因为缺水, 死了很多人。
不可控制过程类	NP + V	听了他的话, 大家笑了。
非作格动词	V + NP	听了他的话, 笑了大家。
可控制过程类	NP + V	昨天, 我们游泳了。
非作格动词	V + NP	昨天, 游泳了我们。

表 4 每组被试者对汉语非宾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可接受度判断的平均值和标准偏差

被试者	非宾格动词	非作格动词
汉语母语组	3.85(0.56)	4.57(0.60)
高水平留学生组	3.77(0.60)	4.30(0.57)
低水平留学生组	3.46(0.31)	3.67(0.40)

别交互效应显著[$F(2, 49) = 8.33, p < 0.001$]。进一步简单效应检验发现,汉语母语组、高水平留学生组和低水平留学生组对汉语非宾格动词句的可接受度平均值均显著低于对非作格动词句的可接受度平均值。

2. 汉语非宾格小类动词的习得结果

汉语母语组、高水平留学生组和低水平留学生组对“NP + V”句式中汉语非宾格小类动词可接受度判断的平均值见表5。由表5可知,汉语母语组和高水平留学生组对存现类非宾格动词的可接受度判断均值高于对位置变化和状态变化非宾格动词的,而低水平留学生组对状态变化非宾格动词的可接受度判断均值高于对位置变化和存现类非宾格动词的。

进一步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汉语母语组对“NP + V”句式中位置变化非宾格动词的可接受度平均值显著低于对状态变化和存现类非宾格动词的可接受度平均值,对状态变化非宾格动词的可接受度平均值显著低于对存现类非宾格动词的可接受度平均值;高水平留学生组对“NP + V”句式中位置变化非宾格动词的可接受度平均值也显著低于对状态变化和存现类非宾格动词的可接受度平均值;低水平留学生组对该句式中不同语义非宾格动词的可接受度平均值没有显著差异($p > 0.05$)。

汉语母语组、高水平留学生组和低水平留学生组对“V + NP”句式中汉语非宾格小类动词可接受度判断的平均值见表6。由表6可知,三组被试者对“V + NP”句式中位置变化非宾格动词的可接受度判断平均值高于对状态变化和存现类非宾格动词的可接受度判断平均值,高水平留学生组对位置变化非宾格动词的可接受度判断平均值高于汉语母语组和低水平留学生组的可接受度判断平均值。

进一步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汉语母语组和高水平留学生组对“V + NP”句式中位置变化

非宾格动词的可接受度平均值均显著高于对状态变化和存现类非宾格动词的可接受度平均值,低水平留学生组对该句式中不同语义非宾格动词的可接受度平均值没有显著差异($p > 0.05$)。

3. 汉语非作格小类动词的习得结果

汉语母语组、高水平留学生组和低水平留学生组对“NP + V”句式中汉语非作格小类动词可接受度判断的平均值见表7。由表7可知,汉语母语组和高水平留学生组对两类非作格动词的可接受度判断平均值均高于低水平留学生组,高水平留学生组对可控制过程类非作格动词的可接受度判断平均值高于对不可控制过程类非作格动词的可接受度判断平均值,而低水平留学生组对不可控制过程类非作格动词的可接受度判断平均值高于对可控制过程类非作格动词的可接受度判断平均值。

进一步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汉语母语组对“NP + V”句式中非作格小类动词的可接受度

表5 每组被试者对“NP + V”句式中
汉语非宾格小类动词可接受度判断的平均值

被试者	位置变化 非宾格动词	状态变化 非宾格动词	存现类 非宾格动词
汉语母语组	3.41(0.60)	3.76(0.63)	4.38(0.62)
高水平留学生组	3.48(0.76)	3.87(0.68)	3.97(0.61)
低水平留学生组	3.48(0.33)	3.61(0.43)	3.30(0.40)

表6 每组被试者对“V + NP”句式中非宾格
小类动词可接受度判断的平均值和标准偏差

被试者	位置变化 非宾格动词	状态变化 非宾格动词	存现类 非宾格动词
汉语母语组	3.67(0.94)	3.32(0.86)	3.41(0.75)
高水平留学生组	4.10(0.68)	3.67(0.84)	3.54(0.66)
低水平留学生组	3.44(0.35)	3.29(0.46)	3.24(0.43)

表7 每组被试者对“NP + V”句式中非作格小
类动词可接受度判断的平均值和标准偏差

被试者	不可控制过程类 非作格动词	可控制过程类 非作格动词
汉语母语组	4.58(0.53)	4.57(0.68)
高水平留学生组	4.19(0.63)	4.40(0.59)
低水平留学生组	3.77(0.54)	3.56(0.40)

判断平均值没有显著差异($p = 0.91$),高水平留学生组对不可控制过程类非作格动词的可接受度平均值显著低于对可控制过程类非作格动词的可接受度平均值,低水平留学生组对非作格小类动词的可接受度平均值呈现边缘性差异($p = 0.05$)。

4. 三组被试者汉语不及物动词的习得结果

进一步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只有在存现类非宾格动词句可接受度判断中,低水平留学生组的可接受度平均值($M = 3.27$, $SD = 0.28$)显著低于高水平留学生组($M = 3.76$, $SD = 0.58$, $p = 0.04$)和汉语母语组($M = 3.89$, $SD = 0.61$, $p < 0.001$)的,高水平留学生组和汉语母语组的可接受度平均值没有显著差异($M = 3.76$, $SD = 0.58$; $M = 3.89$, $SD = 0.61$, $p = 1.00$)。在位置变化和状态变化非宾格动词句可接受度判断中,三组被试者的可接受度平均值均无显著差异($p > 0.05$)。

此外,方差分析结果还表明,在不可控制过程类非作格动词句的可接受度判断中,低水平留学生组的可接受度平均值($M = 3.77$, $SD = 0.54$)显著低于汉语母语组($M = 4.58$, $SD = 0.53$, $p < 0.001$)的可接受度平均值,低水平留学生组与高水平留学生组、高水平留学生组与汉语母语组的可接受度平均值均无显著差异($p > 0.05$);在可控制过程类非作格动词句的可接受度判断中,低水平留学生组的可接受度平均值($M = 3.56$, $SD = 0.40$)显著低于高水平留学生组($M = 4.40$, $SD = 0.59$, $p < 0.001$)和汉语母语组($M = 4.57$, $SD = 0.68$, $p < 0.001$)的可接受度平均值,高水平留学生组和汉语母语组的可接受度平均值没有显著差异($M = 4.40$, $SD = 0.59$; $M = 4.57$, $SD = 0.68$, $p = 1.00$)。

三、结论与启示

1. 研究结论

(1)外国留学生对汉语不及物动词句法特

征的习得

本研究发现,汉语母语者和外国留学生对汉语非作格动词句的可接受度均显著高于对非宾格动词句的可接受度,这表明外国留学生能够区分两类不及物动词句法结构的差异,且对汉语非作格动词句法特征的习得显著好于对汉语非宾格动词的习得,该研究结果符合“非宾格假说”。此外,本研究结果表明,低水平留学生也能够区分汉语非宾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的句法差异,这与薛常明^[4]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在“非宾格假说”的最简方案分析^[11]中,非宾格动词的论元基础生成于实义动词的主语位置,是VP的标示语,共同嵌套在轻动词的补语位置,若论元提升至轻动词前,则需经过VP的标示语位置移位到IP的标示语位置,从而在表层结构中位于动词前;而非作格动词的论元生成于轻动词结构之外,无需移位,无论在表层结构中还是在深层结构中其论元始终位于动词前。由此表明,相较于非作格动词,非宾格动词的句法特征更为复杂,给留学生的习得带来困难。本研究结果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两类不及物动词论元生成位置的不同,与“非宾格假说”相符。

(2)外国留学生对汉语不及物动词语义特征的习得

本研究发现,高水平留学生对“NP + V”和“V + NP”句式汉语非宾格小类动词语义特征的习得表现不同。“NP + V”句式高水平留学生对状态变化与存现类非宾格动词语义特征的习得显著好于对位置变化非宾格动词的习得,而在“V + NP”句式高水平留学生对位置变化非宾格动词语义特征的习得显著好于对状态变化与存现类非宾格动词的习得。结合词义配对测试结果,本文认为,这可能与非宾格动词语义特征、非宾格动词论元语义角色、论元句法位置 and 不同语序句式的相容性有关。汉语非宾格动词终结性语义特征决定其唯一论元的语义角色是受事,在深层结构中位于宾语位置,在表

层结构中位于主语位置。根据 A. Sorace^[12] 的研究,位置变化非宾格动词是核心非宾格动词,其动态性和终结性语义特征最强;而状态变化非宾格动词虽蕴含变化的方向但没有一个明确的终结点,其非宾格性特征较弱;存现类非宾格动词则没有变化语义,仅表示存在,其静态语义特征凸显,非宾格性特征最弱。相较于状态变化与存现类非宾格动词,位置变化非宾格动词最强的动态性和终结性语义特征使得其论元的受事性更为凸显。由此,凸显的受事论元语义角色的句法实现也更易与“V + NP”句式中宾语句法位置相容,易于高水平留学生的习得。“NP + V”句式是汉语的常规句式,“NP”通常是主语,其论元语义角色通常是施事者,在缺乏正语料输入的情况下,把位置变化非宾格动词的受事论元与“NP + V”句式中主语句法位置进行相容,可能会给高水平留学生的习得带来困惑。此外,低水平留学生对“NP + V”和“V + NP”句式中汉语非宾格小类动词语义特征的习得均没有显著差异。基于词义配对测试结果,本文认为,低水平留学生尚未充分习得汉语非宾格小类动词的语义特征。本研究还发现,高水平留学生对可控制过程类非作格动词的习得显著好于不可控制过程类非作格动词,低水平留学生对汉语非作格小类动词的习得没有显著差异,说明汉语非作格动词的施事性语义特征显著促进了高水平留学生的习得,而未显著促进低水平留学生的习得。本研究结果表明,高水平留学生对“V + NP”句式中汉语非宾格小类动词与“NP + V”句式中汉语非作格小类动词语义特征的习得与 A. Sorace^[12] 提出的“不及物动词层级分类”理论相符。另外,本研究还发现,在存现类非宾格动词句、不可控制过程类和可控制过程类非作格动词句的可接受度判断中,低水平留学生的可接受度显著低于高水平留学生的和汉语母语者的。结合词义配对检验

结果,本研究认为,汉语水平、存现类非宾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的语义特征共同影响和制约低水平留学生的习得。随着汉语语言水平的提高,他们能够习得存现类非宾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的语义特征。

2. 启示

本研究结果对汉语二语教材编写与教学具有一定的启示:其一,汉语二语教材编写者应遵照循序渐进的原则,注意把握汉语不及物动词内部语义特征和句法特征的差异及其习得难度等级。其二,应将汉语非作格动词的语义特征和句法特征编写在初级阶段的教材中,把汉语非宾格动词的语义特征和句法特征编写在中、高级阶段的教材中。具体而言,建议把每类不及物动词的语义特征和句法特征编写在同一章节中,语义特征信息编排在前面,句法特征信息编排在后面。其三,汉语二语教师应采用分类教学、先易后难和语义句法句式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来讲授汉语不及物动词的语义特征和句法特征。对低水平的汉语学习者,教师可先讲授核心非作格动词的语义特征及其在“NP + V”句式中的句法表现,再讲授边缘非作格动词的语义特征及其句法表现;对中级水平的汉语学习者,教师可先讲授核心非宾格动词的语义特征及其在“V + NP”和“NP + V”句式中的句法表现,再讲授边缘非宾格动词的语义特征及其在“NP + V”和“V + NP”句式中的句法表现;对高级水平的汉语学习者,教师可采用比较教学法,并结合一定数量的语篇语料,从论元数量、论元语义角色和论元句法位置等不同方面比较分析汉语非宾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语义特征与句法结构的异同,进而帮助学生巩固强化两类不及物动词的语义知识和句法知识。

四、结语

本研究采用可接受度判断任务考察不同汉

语水平的外国留学生对汉语不及物动词句法特征和语义特征的习得,研究结果不仅验证了汉语二语不及物动词句法和语义习得的理论思想,还为汉语二语不及物动词句法和语义习得的难点提供了实证依据,并基于习得难点,为汉语二语教材编写与教学提出建议。因留学生被试数量及其汉语水平的限制,本研究未能完全统一被试者的母语背景,研究结果未能揭示被试者母语对其汉语不及物动词习得的影响。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考察被试者的母语背景,对汉语二语不及物动词习得的影响还可以采用眼动技术、事件相关电位、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等在线研究方法考察汉语二语不及物动词的加工过程及其认知神经机制。

参考文献:

- [1] 赵金铭. 对外汉语教学概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3.
- [2] 朱周晔,熊文新. 基于物性结构的汉语学习者名词短语习得研究[J]. 世界汉语教学,2024,38(2):259-273.
- [3] 袁博平. 汉语中的两种不及物动词与汉语第二语言习得[J]. 世界汉语教学,2002(3):91-101.
- [4] 薛常明. 英语母语者对汉语非宾格动词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检验“非宾格陷阱假设”[D]. 广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06.
- [5] 张玲玉. 泰语母语者汉语非宾格动词与非作格动词习得研究[D]. 新乡:河南师范大学,2021.
- [6] 张蒙. 日语母语者汉语非宾格动词与非作格动词习得研究[D]. 新乡:河南师范大学,2022.
- [7] PERLMUTTER D M. Impersonal passives and the unaccusative hypothesis[M]//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In proceedings of the 4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197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8: 157-190.
- [8] LEVIN B, RAPPAPORT HOVAV M. Unaccusativity: At the syntax-lexical semantics interface [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5: 4.
- [9] SORACE A, SHOMURA Y. Lexical constraints on the acquisition of split intransitivity: Evidence from L2 Japanese [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001, 23(2): 247-278.
- [10] WONG C S H.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L2 acquisition of mandarin unaccusative verbs by English-speaking learners[J]. Advances in the Linguistic Sciences, 2020, 2(3): 35-54.
- [11] RADFORD A. Syntax: A minimalist introductio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 209-218.
- [12] SORACE A. Gradients in auxiliary selection with intransitive verbs [J]. Language, 2000, 76(4): 859-890.

[责任编辑:毛丽娜]



引用格式:朱秀杰,朱欣宇. 外国留学生汉语不及物动词习得研究[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6(4): 104-110.